

# 民心相交促文明对话

## ——兼论池田大作与周恩来的文明对话思想

王丽荣 汤焕坤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 当前多重危机挑战交织叠加,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人类社会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百年变局中面临着直接暴力冲击文明对话的机制、结构性暴力冲击文明对话的基础、权力的压迫冲击文明对话的价值观念等问题, 回顾池田大作先生的“人间革命”理念与周恩来总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以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搭建全球建文明对话的交流平台、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最终实现民心相交促文明对话的实践典范。

**关键字:** 池田大作, 周恩来, 文明对话

在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长河中, 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交汇、共同奔涌向前。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 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 仍存在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 发展鸿沟不断拉大,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因此, 重新回顾池田大作先生的“人间革命”理念与周恩来总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为解决新时代的文明对话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百年变局中文明对话的必要性

#### (一) 直接的暴力冲击文明对话的机制

文明对话的运转机制受到直接暴力的冲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最明显、最严重的方式便是直接的暴力, 它以赤裸裸的方式对人的身心造成最直接的伤害。恐怖主义与战争这些直接暴力冲击着国际秩序的格局, 直接打断文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和平与发展一直是世界的主旋律, 但是最近的加沙地带的冲突、俄乌冲突有将世界推向钟摆的另一边的趋势, 更多凸显人类文明交往与对话的阻碍。从战争的性质而言, “战争是人类暴力和残酷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我相信这些坏的冲动, 是人的本性生来具有的, 是生命本身的一种本质表现。所有生物内部都潜藏着暴力和残酷性。战争就是有组织按制度地发挥这些暴虐性。在战争中, 人与人之间在公共机关国家政府或内战时的临时政府的命令下, 相互残杀。”<sup>[1]</sup>从战争的欺骗性而言, 以国家的名义, 在爱国的幌子下为利益之争的战争最具表象的合法性。他揭露“人与人互相厮杀, 是兽性的大

暴露,而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发泄这种兽性的,就是人人皆知的战争。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是最大的犯罪,国家会给予严厉的制裁。可是同样的杀人行为一旦在国家的名义下大规模地进行,等待着的却是勋章,国家还要把他们捧为英雄,这岂不是说大规模地杀人反倒无罪,而杀一两个人却有罪了吗?”“相反,进行战争的主体却是严禁出于个人动机杀人的国家,并且对国家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建立制裁制度。至今还通行着胜利者即为正义这样极其野蛮的法则。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人类几千年来默认了这一谁都无法接受的荒谬逻辑。”直接的暴力导致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平等对话机制的中断,文明对话的基础政治互信淡然无存。

## （二）结构性的暴力冲击文明对话的基础

经济压迫可谓是经济领域的看不见的强者欺负弱者的战争,这导致文明对话双方的基础受到冲击。20 世纪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外,还带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为缓解经济带来的危机,经济强国以强恃弱,利用经济强势优势地位控制市场、控制流动资本、实现利润掠夺,最终逐步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就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说,粮食过剩的只是一部分发达的国家出现,甚至会因为粮食过剩出现倾倒牛奶事件、人们身体健康受损甚至死亡等情况。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要赶上人口的剧增完全是悲观的。随着经济鸿沟、技术鸿沟等结构性暴力带来的国家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全世界各国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人民有非常多的人陷入到食不果腹的现实之中,却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状况。池田先生甚至认为,日本放弃了粮食自给自足的责任,把工业等列为重点,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得到粮食,甚至从贫困的国家购买粮食。在这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实际上并不够,很多人因此成了牺牲品。由结构性暴力带来的贫富不均,导致部分文明主体是否能够存续仍需要探讨,更加不能接受由经济带来的挑战。经济弱势的国家与经济强势国家之间因为结构性的暴力冲击无法真正实现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

## （三）权力的压迫冲击文明对话的价值观念

个体生命是在社会中生存,而社会要存在与发展就必须需要一定的秩序与制度,由之产生权力及权力的掌握者,也易于衍生出权力的压迫与弊端。权力是一种支配、强迫或压抑的力量。权力本来是用来保护大多数人的,所以它应该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因为当权者的心理动机和目标意识而变得邪恶。所谓权力的弊病,原意是说权力有一种本质会强化当权者骄傲自大、贪图名利的思想,使其堕落。而权力的行使又隐藏着侵犯人格,有时会危险到剥夺人的生存这种性质。如:“强大的丑恶势力,把弱小的丑恶势力集聚在自己的手下,膨胀为越来越大的丑恶势力,这就是乱用权力的实际情况。”<sup>[2]</sup>近年来,民粹主义崛起、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更加暴露出带有民主时代下的人类文明现实所面临的困境。但是,权力压迫表现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应对自身面临的内外挑战,却不断宣

扬“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论调，直接冲击了文明平等对话的价值观念，无法实现文明之间包容共处。文明冲突论提供给现实的思维定势，文明的发展到最后必然存在冲突，权利在文明之间体现为自认为优势的文明必然会占领自认为劣势的文明，积极不利于文明的交流，无法达成统一的价值观念。

## 二、 文明对话的共同理念

### （一）以人为本

真正把人作为一切的根本，是文明对话的起源。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思想观念以及不断进化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人这个根本，也不会有不同的文明。池田大作先生的“人间革命”理论与周恩来总理所主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论都共同体现了文明对话的根基在于人。

池田大作的“人间革命”理念就是以生命的尊严为价值，人性必须进行内在的革命。人至高无上的价值就是人的生命本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战争的人民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因此生命的重建与复兴就显得极为重要。池田大作的“人间革命”的理念就包含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反思，对人类发展价值取向的理性审视。首先，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人的生命。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发展的本能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在佛教教义中，地球上一切众生至高无上的就是生命本身，最宝贵的也是生命本身。人与世间万物的区别，就是从真正意义上人的生命具有根本性特点。“它决定了人类的这种本质性的客观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观点，是把生命看作没有等价物的、至高无上的观点。”<sup>[3]</sup>其次，生命的尊严就是人的最高价值，因为人在社会上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就是保存生命。池田大作认为人类的行为在社会上是有各种价值取向的。有人会主张通过个人爱好表达价值，也有人会主张追求社会阶层跃升、财产增加等社会体制作为价值的取向。还有如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泽所主张的生命伦理——“敬畏一切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池田大作先生与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有类似的生命价值观，他认为世间万物的生命的一切平等的。人们习惯用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以确定事物的价值，但这完全是一种片面主观的看法。由此，池田大作强调：“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目的，绝对不可将之变成手段。正是树立了这样一种生命的尊严观，因此才可以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最重要的命题。”

周恩来总理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他说的本就是指人民群众。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sup>[4]</sup>周恩来总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的核心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总理经常下基层调研，他喜欢深入到群众中，乐于和普通农民交朋友。他认为跟人民群众交朋友，群众才有可能跟他交心，能够听到不同的利益诉求。他的基层调研会特意

选择“突然袭击”的方式，以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真正做到心系人民群众疾苦，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所急，与人民心连心，同甘共苦，共同进退。周恩来总理以人为本的思想使他成为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在外交领域，他求同存异的思想，多次运用灵活的外交方式，丰富的个人风格魅力，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的非常难得的局面，赢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赞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认为周恩来总理的离去使世界失去了当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 （二）尊重他者

尊重他者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表达，是文明对话的基础。不仅关注人类自我，也要尊重其他生命存在，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目的，才有可能实现文明的发展与延续。池田大作的生命视野给我们人类的视角，

池田大作认为“生命”的视野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视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上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空间上看，全人类共同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怎么样才是实现人类文明的根本利益，是在尊重他者的前提下，探寻人类的共同的精神之路。池田大作认为，“生命”可以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的视野。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生命的议题才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于个人利益，只有生命才是平等与唯一。人是生命的存在，乃是超越任何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事实。因此，尊重他者生命的存在，才能突破一切狭隘的文明视野。

周恩来总理无论是作为总理还是全面负责外交时，都能真正体现对他者的尊重。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等西方大国不甘失败，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威慑。周恩来在担任新中国总理和外长后，首先在外交方面展开了艰苦的突破，并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立精神。新中国的外交理念始终是和平与发展，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印度是我们的邻国，因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等历史原因，与我国还有遗留边境问题。但是为了与各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发展，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同印度就解决两国历史遗留问题在北京谈判。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在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很多国家在当时还不太理解新中国，但“和平共处五项”一提出来，立刻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赢得了包括亚非拉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也为新中国的外交赢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尊重各国、各主体平等的前提下，尊重他者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和平与发展。

## （三）反对冲突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高于其他文明，沉溺于文明优越论势必会造成冲突。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已经成为现实文明交往

过程的思维限制，因此我们应该反思文明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冲突？杜绝现代战争的爆发以实现持久的和平共处呢？

池田大作给认为应当在国际交往中充分关注到“同样都是人”这一客观事实。池田大作极力号召包括政客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有一种自觉的“全球公民”意识。因为人类只有在完全认可了人类的共同尊严之后，才会发自内心地憎恨战争，打破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念，真正关心世界的和平和繁荣。他曾指出：“人有各种不同，是多样的，但是有超越差异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同样是住在这地球上，同样是人。而且在经历生老病死这一生中，谁都在拼命努力，要争取幸福，追求和平。立足于共同点，就会达到可以共有的思想。即生命是充满尊严的，谁都有生存的权利，有获得幸福的权利。因此，绝不容许战争。”<sup>[5]</sup>

周恩来总理不仅反对冲突与战争，即便在曾经经历战争的中日问题上，都显示出宽广的人类视野。在中日还没正式建交，他就非常重视中日的正常化交往，他倡导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在中日关系发展中至关重要。他认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中日的关系直接影响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应该尽早实现正常化建交。过去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对日本的普通人民同样也带来损害，两国人民迫切希望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因此周恩来总理一直在中日问题上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法，在开展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加人民的交往，增加民间团体的协商具体问题上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突破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框架的思维限制，文明的交融论更符合人类发展的根本现实利益。

#### （四）共同价值

只有把全世界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在生命价值观念上等同起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包容他人，求同存异，世界文明更加多彩。从人类的视野看文明的交流，才能够在交流中找到共同的价值。无论世界文明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见解有什么不同，都应该尊重人民之间的沟通，建立对话的体系，坚持文明之间要有对话，才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在1955年4月亚非全体会议上，当出现有不利于的声音出现时，周恩来并没有急于反驳，而是静待时机，在最后总结发言中正式提出“求同存异”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sup>[6]</sup>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应尽力追求会议的共同愿望。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亚洲、非洲中绝大多数刚刚争取了独立运动的国家，都经历过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灾难，甚至有一些非洲国家还在经历殖民的迫害。我们跟大多数亚非国家一样，都争取国家的独立，反抗发达国家的各种殖民方式，反对大规模的战争，主张亚非各新兴国家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独立自主的实现国家的发展，实现亚非人民大团结。

周恩来的讲话得到了在场人的高度赞许，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后来与亚非大部分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友好的基础，为文明的对话形成共同的价值。

池田大作先生与周恩来总理，虽然一个是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一个是“联合国和平奖”得主，他们却拥有共同的文明对话理念并真正为此做出巨大的实践，特别在推动中日建交问题上堪称典范。

### 三、 民心相交促文明对话实践

#### （一） 搭建全球建文明对话的交流平台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sup>[7]</sup>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好载体是人，深化人文交流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创价学会向来都是积极反战、追求和平的民众团体。创价学会以宗教为媒介，弘扬了平等的世界观，加强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交往，包含了夏威夷、美国、加拿大等，连接亚欧、美洲大陆。池田大作认为，民众之间的心与心沟通交流，虽然是人们肉眼看不到的现实，但是它确被认为是最紧密的存在。因为无形的东西如果真正形成了，这才是现实中最坚实的纽带。在中日还没有正式建交时，池田大作就已经洞察到“日中友好是世界和平的关键”。所以在当时如此境况下，他却义无反顾地发表了“池田倡言”，亲自前往中国与真诚的周恩来总理结下“一生只有一次”的深厚情谊，体现了人性的光辉。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成功地为中国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友情之桥、信赖之桥，为文明交流对话建立良好开端。

在中日关系未正常化之时，当时日本政府重光外相提出“中日两国人民来往太多了不好”的观点，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他认为：“在中日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所以日本朋友来得越多，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码头为你们开放得越多，那就越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sup>[8]</sup>周恩来总理深知人民才是文明对话与交流的核心。为此，周恩来在首先用中日经贸领域作为突破口，特意安排我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义，先后于1951-1952年间给一部分日本经济界人士写信，邀请他们参加苏联国际经济会议，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这封信立即得到了正欲开展日中贸易的日本各界人士的响应。本着以人为本的观念，深知战争对普通民众的伤害，协助日本侨胞回国，得到大量日本人民的赞誉。同时，民间文化艺术、学术交流也有较大进展，当然还包含与日本民间宗教与政治团体创价协会以及池田大作先生的交往，为中日友好交往事业增添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针对中日关系，总书记还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指出：“中

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sup>[9]</sup>文明交流应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理念相容、情感相融为目标，以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和促进对外关系发展为根本。需要积极发挥人文交流对中日关系的建设性作用，充实双边关系内涵，拓展友好合作空间，为东亚区域合作发展创造条件，树立典范，注入动力。

## （二）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人类文明在差异化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内核，这是将不同文明、国家、民族连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深层驱动力。不同文明之间要实现合作，弘扬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共同的价值。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不同认识，尊重不同国家和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坚持求同存异。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相互尊重，才能真正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多样化的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

池田大作十分推崇平等尊重、宽容求同的对话精神。他说：“‘对话的文明’，绝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向身边的邻居或邻国的人们敞开胸怀，面对面。即使思考方式不同，也要予以尊重，诚恳地侧耳倾听，坚持不懈地交谈。而且要共同摸索创造价值的道路，共同前进。”<sup>[10]</sup>池田大作先生也十分重视国际青少年的交流与教育，其创立的创价大学的三条校训，即“成为人本教育的最高学府”，“成为新的大文化建设的摇篮”，“成为保卫人类和平的要塞”，充分反映了池田先生以教育为载体来促进人类幸福与和平的基本理念。20世纪70年代初池田先生就先后与英国、法国、美国、中国、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在办学理念、教学经验、人员交流方面展开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互相接纳对方的留学生。创价大学学生也意识到，为了永久和平，必须提高国际语言交流能力，深入研究各国文化，加深与各国间的相互理解，组织了多方面的研究学会，如自1968年9月池田大作在日大讲堂学生部总会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宣言后，创价大学学生就成立了“中国研究会”。1975年，创价大学成为首个接收来自新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大学。截止至2023年1月，有来自世界55个国家、超过500名留学生在创价大学学习。池田大作先生极其重视留学生在推进各国友好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加强以留学生为中介的人员友好往来，认为，肩负未来的青年们带来不受国界约束的视野，而且这些在大学生活中结成友谊的青年们很快成为各个国家的领袖时，就可以防患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纠纷于未然，给文明的对话留下许多可探讨的空间。

周恩来总理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本着战争不应由人民来承担责任，要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日本政府中的决策者和一般人相区别的原则，善于抓住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和平愿望，推动中日的建交与文明的对话合作。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闹不愉快的时间是极少的时间。中国人民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互通贸易，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保障远东和平，只有这样，才对中日两国和人民都有利。因此，

虽然中日政府间仍未正式建交，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中日两国民间团体除贸易以外，陆续签署了渔业、侨民、文化、科学、工会等许多协议，交往日益增多。

### （三）推动实现全球文明交流互鉴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交融与互鉴。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池田大作先生提起“自他共同发展”的精神和创造活动的关联性时说道：“无论有多么高度的知识，没有把它深化为自他共同幸福有效利用的‘哲学’和‘人格’，其知识就不能创造价值。”就是说，不考虑别人的利己主义就不产生价值，为自他共同利益尽力时才能创造出价值。“自他共同发展”的精神来源于池田思想基础的佛法生命尊严的哲理。池田大作先生认为人的最终意义就是要创造价值，不同文明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创造与他人共同幸福的价值，提倡培养世界公民的意识有助于推动实现全球文明之间的互鉴。

1955年，成立仅7年的松山芭蕾舞团，在创始人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的坚持下，顶着重重压力，将中国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改编搬上芭蕾舞的舞台。作品在日本首演获得空前反响，连加座都卖光，白毛女的悲惨命运深深打动了日本观众。同年周恩来总理安排接见他们，并进一步沟通如何增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互鉴。1972年，此时正值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亲自布局，上海舞剧团赴日本公演《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在中日两个都获得热烈反响。长达半个多世纪，芭蕾舞剧《白毛女》为中日两国的友谊架起坚实的艺术桥梁，也为文明的交融做出典范。

## 四、展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势，在第78届联合国通过中国提出把6月10日设定为“文明对话国际日”之际，重温池田大作与周恩来总理文明对话的理念，展示出他们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尊重他者反对冲突的信念，不断探寻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价值，尽可能为国际社会消除分歧、增进互信、实现文明的交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 参考文献

- [1] [英]汤因比, [日]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荀春生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5: 250.
- [2] [英]汤因比, [日]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 [M]. 荀春生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85:260.
- [3] [日]池田大作. 新・人间革命:第 13 卷[M]. 创价学会, 译.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0:51-52.
- [4] 习近平.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22
- [5] 曹婷, 邓佳梦. 池田大作人性外交理念与实践[J]. 大连大学学报, 2023(4).
- [6] 周恩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112.
-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465.
- [8] 孔繁丰、纪亚光.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26.
- [9] 习 近 平 . 在 中 日 友 好 交 流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EB/OL].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1209\\_676846/201505/t20150523\\_799299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1209_676846/201505/t20150523_7992998.shtml). 2015-05-23.
- [10] [日]池田大作, [美]杜维明. 对话的文明[M]. 张彩虹, 译.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227